

#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訢》摘抄

茅海建 著

2024 年 8 月 5 日

# 苦命天子

咸丰皇帝奕訢

茅海建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 历史作为已经发生的事实，应当是非常客观的，但历史研究又是相当主观的活动。

任何一步历史著作都是史学家对史料的一种主观解读，在不同人眼中的历史面目会有差别。我想，我一定会有误读，但使我心安理得的是，现代历史学理论居然已经证明，误读也有其存在的价值。

2. 清代制度，皇室男性名字第一个字表示辈分，由康熙帝确定，排名次序为允、弘、绵、奕、载、溥等；而皇帝之子第二个字使用同一偏旁。

3. 大约从 1845 年起，步入老年的道光皇帝就像众多老年人一样，贪图政治安静、耳边安静，“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皇帝身边的军机大臣也就报喜不报忧，掩饰真相，封杀言路，专拣好听的说给道光皇帝听。当时京师中有一制联云：

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

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

这一制联的矛头是对着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

4. 道光帝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穆彰阿能长居政坛不倒，乃是取法道光帝的另一亲信曹振鏞，以“多磕头、少说话”为政治秘诀。穆彰阿位于首辅，几乎每天都被召见，他很少建言，每遇垂询，必尽力揣摩帝意而迎合之，而不究事理本身。他对于道光末年的政治败坏，应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5. 紫金山下玄武湖畔的南京号称虎踞龙盘的名城，曾为六朝故都。明太祖朱洪武元璋在此开基立国，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仍以此为陪都。清代以北京维首都，以盛京（今沈阳）为陪都，改南京为江宁。当时的文人墨客又多用古名金陵。但南京这个名词，一直没有从老百姓的口中消失。去掉一个名称容易，抹去一片记忆甚难。这个在当时南中国最大的城市，为清代管辖苏、皖、赣三省，兼理漕、河、盐三务的两江总督的驻所，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

6. 1854 年 4 月 28 日的靖港之战，是曾国藩一生最大的失败之一。湘军水师被太平军打得大败，增援的陆师又闻败而溃。恼羞成怒的曾国藩以文弱书生之躯亲自执

刀督阵，置令旗于岸边，上书“过此旗者斩！”哪知溃逃的士兵绕旗而奔，局势变得不可收拾。心冷至极的曾国藩投水以图一死了之，被幕僚们救护回长沙。

7. 江西的日子是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皇帝的不信任，同僚们的镞射（**镞，读作镞（dí 或 dī），1、箭头，亦指箭。2、一种金属元素。**），使他在功业难成的情况下“不欲复问世事”。1857 年 3 月，他接到父亲病故的讣告，奏报丁忧后便委军而去，直接跑回家乡守制了。
8. 清朝的财政体系是一种相当落后的制度：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固定的，约银四千万两，主要来源于地丁钱粮；每年的支出也是固定的，近四千万两，主要用于官俸兵饷。其基本特点是量入为出，而由此引出的最大弊端，就是缺乏弹性。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为政者没有钱去开办新的事业，而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如水灾、旱灾、蝗虫、战争、瘟疫，政府的收入锐减，支出剧增，往往会引起财政危机。
9. 到处罗掘，千方筹措，使咸丰帝从 1850 年至 1853 年 7 月，总共弄到了近三千万两的银子供应前线，换来的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而到了此时，咸丰帝已经山穷水尽，户部存银仅 29 万两，就连京官京兵的俸饷也都发不出来了。
10. 咸丰一朝，是清代历史上货币制度最为混乱的一朝。
11. 1853 年，刑部侍郎雷以誠奉旨帮办扬州江北大营军务，主要任务是筹饷。这可是一件极难办顶费力的差使。可他的一个幕僚钱江，当时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向雷氏出了一个主意：派官兵到各水陆要冲设关卡，对通过的货物按其价值强行派捐（这实际上是商品过境税，当时又被称作“行厘”）；另对开店销货的各商人按销售额强行派捐（这实际上是商业税，当时又被称作“坐厘”）。厘捐的交纳者亦同其他捐纳者一样，领到捐得何种功名的部照，只不过这里面也没有自愿的色彩了。
12. 按照清朝的财政制度，一切财政收入均归于中央，各省、府、州、县要弄点钱，只能在“耗羨”等名目上打主意。自 1853 年夏天之后，中央财政已拨不下军费，本无

正当财源的省级财政却要负担为数甚巨的各军营军费。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征收渠道，谁也不肯将此交到中央财政去。厘金由此成了不受中央控制的大财源，由各省督抚所把持。也就在这一时期，厘金渐渐脱离了“捐”的范围，明确了“税”的身份。

13. 厘金的出现，应当说是弥补了商税的不足。从以后几十年的历史来看，它和关税的蓬勃发展，使清朝财政的基础由农业转向商业。就这一点而论，应当说是有意义的。
14. 厘金与湘军，是咸丰一朝的两大变局。银与兵，是咸丰帝当政之初日夜焦虑耗尽心力的两件事。厘金和湘军正是应朝廷之急而生，可以说它们挽救了清王朝的危亡。可是，财权和兵权，这两项在任何国度中都极为重要的权力，渐渐地落到了地方督抚手中，朝廷的权力也慢慢地只剩下任官命将一项（这一项权力后来也受到了侵蚀）。厘金和湘军开始了晚清中央权轻、地方权重的新格局，原来的统治秩序从内部开始了变异。
15. 家贫出孝子，国乱出忠臣。
16. 咸丰帝的曾祖父乾隆帝规定，清初开国定基的八位王爷，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后改号庄亲王）、克勤郡王岳託、顺承郡王克德浑的子孙中可有一人“世袭罔替”，即不必降爵而按原爵袭封。此八人，即民间俗称的八位“铁帽子王”。
17. 专制君王的好恶引导着文化流派的兴衰。
18. 在咸丰朝的汉族官员中，曾国藩是咸丰帝最为疑忌的重臣，叶名琛是咸丰帝倚为长城的疆吏，两人正好形成对照。
19. 叶名琛的所作所为，被时人讥讽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吏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20. 互换条约批准书，只是一个程序问题。英、法、美等国之所以坚持要在北京互换，是因为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在两广总督衙门发现了《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鸦片战争后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批准文本，对这些重要的文件不是由中央朝廷保管而是由一名地方官员保管感到十分惊奇。如果英、法、美等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会更加惊奇，因为这些条约的正式文本从来也没有到过北京，且不论这些英、法、美盖玺的文本互换后一直存放在广州，就是英、法、美收到的由清朝盖玺的文本，也是根据两广总督的请求，由军机处将盖有国玺的黄纸送到广州，再由两广总督贴在条约正式文本上的。“天朝”的大皇帝绝不会，也不该去看这些不光彩的东西，他们只看见过按照一定格式抄录的抄件。清朝之所以不愿意在北京互换条约，是因为听说公使们到了北京后要按照西方的惯例，用西方的理解觐见皇帝、亲递国书！
21. 然而，这一吉祥年，又成了灾祸年。也许从这一年开始，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逢十大寿，凶多吉少。继咸丰帝之后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那拉氏，四十大寿遇日军侵台，五十大寿遇中法战争，六十大寿遇中日甲午战争，而七十大寿虽没有中外开战，但日本人与俄国人却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起来了。
22. 由此而产生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特现象：在中国北方与清中央政府作战的英、法两国，在上海地区却与清地方政府进行军事合作。本是对手，却成战友。
23. 经营三载，耗帑（tang3）数十万，安炮数百位的大沽炮台，在此次战斗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8月23日，英法联军进据无人防守的天津。
24. 后来的名士薛福成谈到咸丰朝的祁（祁寯藻）、彭（彭蕴章）两位相国，说了一句极中肯的评语：“有学无识”。即有学问，无才识。学问与才识从来不是等同的，而当时的学问与才识往往背道而驰。
25. 我们在此可见一有趣的现象：祁寯藻、彭蕴章虽为汉人，但对汉人统率的湘军多加

诋毁，文庆、肃顺虽为满人，但对曾国藩等人却极力维护。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若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清朝长久的文化专制引起了汉人的心理和思维的异化，不能说是清中叶后满洲贵族的迅速腐败而引起满人中有识之士的自我觉察。

26. 一是救了左宗棠的命，一是成就了曾国藩的事业，肃顺在此中施展了老到圆滑的政治手段，不动声色之间改变了帝意。左、曾两人后来的表现也证明肃顺挽救了清朝。仅仅凭着这一点，不论肃顺如何擅权弄势，仍可以说是清朝最好的“宰相”之一。
27. 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1809-1881），因侵占中国东北边疆大片领土，被封为“阿穆尔（黑龙江）伯爵”。
28. 据此，今天的人们完全有理由称，《中俄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祸害中国最为深重的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不平等条约。
29. 赫德（1835-1911），英国人。1863 年任总税务司，控制中国海关长达 45 年，制定并推行西式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并注重近代海事、邮政诸建设。1908 年离开中国。
30. 奕訢热衷于西方事务的姿态，背离了传统的祖制。在西方外交官拍手叫好的同时，也使许多守旧的官员感到不适，暗地里送他一个外号——“鬼子六”。
31. 肃顺和奕訢，兄弟排行皆为老六，两位“老六”在暗地里开始较量。
32. 按照宫廷的规定，妃嫔等怀孕八个月左右，生母可以进宫陪待产的女儿同住一段时间。这也是清宫中难得的一项合乎人情的规定。
33. 1858 年 3 月 19 日，玫贵人徐佳氏又产下一位男婴，未经命名当日旋殇。从此至 1911 年清朝灭亡，清皇帝后宫中再也听不到新生婴儿的哭声了。
34. 所谓“看桌”，即是放置几十种菜肴，但皇帝只看不吃，以显示钟鸣鼎食的皇家风派。